

試評「打牛滿村」

一、鍾理和時代的農村

民國三十八年頃在臺灣的土地改革，在臺灣的土地制度史上，是一件事，而在下列的幾點上，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這個土地改革，使具有兩百多年歷史的臺灣本地地主，做爲一個階級而被消除。地主佃農的土地所有關係，不再是農村中主要的所有體制；農村地主，再也不是農村中重要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領袖，從而農村地主在農村中，從整個臺灣的政治和經濟的舞臺上，迅速地消失了。

其次，隨着農村地主階級的崩潰，土地改革產生了一大批中小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儘管背負着一定時期的債務，在所有權上，很多農民新得了自己的土地，大大地提高了農業投資和勞動生產的熱情。於是農業生產力獲得極大的發展，使農村物質財富增加，而成爲具有購買力的市場，爲臺灣的資本主義工業化，預備了好的條件。

因此，民國四十二年以後的十年裏，在全世界戰後第一個恢復在繁榮期中，在大量美援的協助下，臺省也有了極為安定的成長。從日本帝國主義主權的國家獨佔資本企業全盤接收過來，而成為國民經濟主權的國家獨佔資本企業，加上以恢復了購買力的農村市場為溫床而逐步養大的臺灣民間資本企業，到了民國五十二年，終於使工業資本產業在臺灣的整體產業結構上，超過了農業資本產業，而為另一個加工貿易出口經濟時代，即在整個產業結構上工業資本產業急劇上升，農業資本產業迅速下降的另一個十年，做好了準備。

死於民國四十九年的鍾理和，便在他所做的小說中，記錄了這個時期的比較窮、比較偏僻的農村。在鍾理和的農村中，農人依然很貧窮，但他們却異常的勤勞，却差不多沒有怨言。至少，對於新的耕地的無數分散的小農，總是相信只要拚命地把勞力注入土地，終於有一天土地會償還更好的酬報。

二、資本經濟下的小農體制

一九六〇年代，是世界先進國家大繁榮的時代。六〇年代初，美援終止，改以投資的形式繼續介入臺灣的經濟。在六〇年代面臨金融恐慌的日本資本，在資本的集中化和精密化後，把過剩資本，伸向臺灣。臺灣於是展開了十多年加工貿易出口的經濟，工業生產指數以一九六三年的一〇〇增加到一九七三年的六〇二，產業結構也有了很大的再編成，即農業生產部門急速下降到一九七二年的二四·八四，而工業生產部門則上升到同年的三八·九六。

吸取農業、農村的血乳而長大的工業資本，使臺灣的產業資本主義有了空前未有的繁榮和成長。正是在這個時期內，臺灣的民間獨佔性資本形成了，並且大大地降低了國營企業在全部資本中所佔的比率；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中，我們的國民經濟在加工貿易出口為主導的體制中，形成對於一、二大國之市場、資本、商品和技術的高度依賴。加工區、新的工商業市鎮興起，從而也產生集中在這些市鎮的工商資本家，和依附在工商業的大量的中產階層，及以集中在工廠四周的工業勞動者。

在這些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中，臺灣的農村面臨了一些特殊的問題。為了防止土地的再兼併，我們的土地改革在法律上阻止了土地向一個巨大的土地資本再次集中。財產平均繼承的法律，使本來不大的土地，不斷地零細化。這是一個方面。

資本主義的強大影響，向農村澈底地滲透。臺灣的農產品，便巨細無遺地組織到資本主義的商品中。這又是另一個方面。但是土地的零細化和農業生產規模的細小化，是和資本主義對農業的要求——大土地規模的農場，在現代農業技術條件下的大量生產和品質的統一，以及從生產者到消費市場間一貫的、靈活的、有效而迅速的經營等等，是互相矛盾的。

臺灣內部市場，甚至國際市場對臺灣農業商品的要求，和分散的、零細的、經營上比較散漫、比較落後的小農民、及他們的小田地，也發生了矛盾。正是在這個矛盾上，產生了宋澤萊所寫的「包田商」人，這些「包田商」，經無數的小農的生產品中，挑挑揀揀，然後集中起來。藉着這些商人，農業生產部門才能完成資本主義商品之品質的統一、和大量生產的要求。

三、中間榨取下的農民

在前，資本主義的時代，農產品主要地，首先是農民的食料。食而有餘，才拿到市場上去交換。在經營上，也比較傳統、比較落後。但是，在今天，農產品具有空前的商品性質。農民爲了賣出而種植；農民也順應、預測國內甚至國際市場的需求而種植。在過去，人畜的糞便等天然肥料，是作物主要的營養。今天，化學肥料、除蟲劑、專門的飼料和飼料減加劑，動物疫苗……等等，成爲不可缺少的投資。農民必須以貨幣購入各種現代工業產品以爲資本，投入農業生產行程，才能使農產品符合現代市場品質上的需求，並儘量減少栽培和飼育過程中的損失而保證量的增大。另一方面，他們對於詭異萬端的市場，毫無所知。他們沒有現代記帳計算的知識，缺乏現代資本主義經營的精神和技術。此外，他們更沒有能力將農產品運銷到各個消費市場，將農產品賣給國內和國外的消費者。他們盲目地種植。幸而遇見求過於供，農民驚喜地賺一筆單憑老老實實地種稻是永遠無法掙到的錢。有時候，供過於求，農民便無助、惶恐，不明所以地虧掉一筆如果老老實實種稻子是怎麼也不至於虧掉的那麼大的錢。更多的時候，他們任憑「包田商」和菜販、果販的搾取，忍氣吞聲，而無可如何。

四、打牛浦村的現實性

宋澤萊的「打牛浦村」，便是以一九六〇年代初以迄於今日的，變貌中的臺灣農村爲背景，

描寫生活於這個背景中的人的困境。在資本主義下的農村，農產品徹頭徹尾地變成了商品。

包商和農民

在過去，農民種的菜蔬瓜果，自食以外，才拿到附近的市集去交換農民所需的日用百貨。但是今天，農產品的市場，已不只是農村附近的市集，而於比較遠、比較廣闊的大都市，甚至是外國的市場。以打牛浦來說，全村的人在稻作的間隙，一律種「梨仔瓜」。自己吃不完，附近的市場也消化不完。因此，這些梨仔瓜必須運到諸如臺北、臺中、臺南……等大的消費都市。如果是外銷的蘆筍、柑桔、洋菇，則以更遠的外國市場爲指向。

但是分散的、零細的小農，對於市場的各種變動不居的情況毫不理解，也沒有財力把產品直接運到消費都市去。今天的農民，千辛萬苦地把作物種出來以後，却立刻要面對他所無從理解、無從把握的問題。出賣農產品，成爲他們頭痛、駭怕的問題。「包田商」便在這個背景上，向廣泛的農村滲透：

貴仔一聽便曉得這幾個人是高販，中盤的，他們組織了採收集團，每當梨瓜熟時，他們到鄉底下來，包攬大批田地。打牛浦有些人害怕賣瓜果，便乾脆把田包給他們。橫豎這些商人自配卡車，在臺北市又有商行。

一方面這些包田商人熟悉全省各地的菓蔬商情、價格，有運輸的工具，有遍佈的銷售網。另一方面，零細的小農，不但昧於實際商情，沒有資本自設運輸工具和銷售網，更因爲沒有組織的

力量，而完全失去議價的能力。於是在包田商獨佔的市場下，農民只好把自己勞動成果的大部份，任由包田商搾取，以免血本無歸。

資本對於利潤的慾求，是不知限制的。以分潤他人的勞動成果為特色的商業資本，尤其是用擴大這分潤的比率，即儘量壓低生產者勞動結果的價格，來完成搾取。恃雄厚的資本、運銷工具和市場獨佔以搶掠別人辛勤血汗的包田商人，便與農民小生產者之間，形成了矛盾和衝突：

「剛才那塊田的阿吉泰說三分地只要七千塊，就可以包給我們，」展昭說：「所以我們也想用七千塊錢來包你的。」

「七千塊？」貴仔又楞了一下，他說：「頭仔，你吃了瘋藥？你昨天說還可以加價咧。」

「那是估計的，」展昭立即回答說：「現在那塊好的才只七千塊，大家都已看到了。」

貴仔終於不楞了。他已摸清怎麼回事。原來長痣毛的這批包商說話不算話。今天的價不同於昨天的價，自然一分鐘以前的價也不同於一分鐘以後的價。貴仔有些慌了。但他的慌又誘使他黑暗底心澎湃起來。

「頭仔，不要昧着良心說話。昨天在柳樹下大家也聽到：比李來三好的就可以加價。」

「唉，蕭老弟，」長痣毛說：「做生意是兩相情願的。若我們願意的話，一萬塊也可以包下來。」

「正是，」展昭又接腔，以指代劍的指頭在空中亂舞。他說：「最多七千五。」

「什麼話！」貴仔終於因為黑暗底心而萌發了怒氣。伊說，「我比李來三的好，價格却比他差。你們莫要來欺騙我吧，你們只會欺侮人嗎？」

「蕭先生，你要諒解。」展昭說。

「諒解什麼？我是好欺詐的，幹伊老母，我蕭貴是惡人嗎？」

貴仔終於忿怒起來了。大大步踏到田裏去，嘩嘩地掀開葉子，東抓西摘地抱了一大堆犁仔瓜上來。

「你吃吃看，幹伊老母，只包七千五，我都穿願放火燒掉。這個黑暗的無天無良的世界。」貴仔叫着，便用力砸破一個，把水澆澆的瓜果擧到展昭的臉上。展昭嚇一跳，便要走開，但臉上已被塗得一片黏膩。

「你幹什麼？」展昭叫起來。伊沒料到打牛浦有這樣凶狠的人，一時間便招架不住。

「你也給我吃！」他對長痣毛說：「這樣的犁仔瓜你意思包七千塊。」

「不要亂來，蕭先生，我們是生意人。」

「你是生意人，乾伊娘，沒良心的那種生意人！」

蕭貴很生氣了。伊一跳，便落到草叢去，掣出一把鋤頭，把鐵片拆了，顛顛地舉着要打長痣毛的。

「蕭貴殺人了！蕭貴殺人了！」

伊們大聲呼叫起來。

農業性商品，不比一般商品，經過一定時間，收穫的蔬菜，便會污爛。農產品的這一特質，在包田商、瓜販資本獨佔的市場下，無組織、無議價能力的小農民，競自殺價求現，以支付栽種期間因購買生活材料或農業投資所造成的債務，而使深刻地浸透於農村的農產品中間商人的資本，顯露猙獰、冷酷的貪慾。

瓜販和農民

以經驗老到的目光、豐富的市場背景知識，對農民弱點充分的把握來到田裏包田的商人，和專待農民將菓蔬採摘淨洗後拖運到市集裏，再出而議價收購的瓜販，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這些商人實在不宜稱為「菜蟲」或「菜蠅」。伊們更像一隻精巧的牛蜂，知道那一條牛肉比較香；那一地方是多血質，還可以來這隻牛的眼睛瞧出他是笨牛、怒氣的牛或乖巧的牛，必要時還可以從牛角上叮出一口很好的血來……。

然而在市集上，面對着惶惑的、焦慮的、分散的、無知的農民，他們可以用更多的狡計和威嚇，去搶奪農民的心血。在「打牛滿村」裏，我們至少看到三種訛詐的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佈置幾個人串通包圍，局部封鎖市場的行情，然後製造瓜價猛跌的錯覺，逼使農民賤價賣出。

「你的梨仔瓜不好，只賣二塊五。」

笙仔和他的妻子都嚇一跳，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當時大家都賣得很鬆闊，隱隱中聽到有人喊三塊錢。

「賣不賣？」商人又問。

「不賣。」伊的妻子說。

商人便跑了。

那時太陽赤燄燄，大家都想趕快回去，整個市場繁忙動亂，但商人真會計算，伊們只是在那兒拖磨着。

大約又過了二十分鐘，又有一個瓜販走來，也不看他們的梨仔瓜，便說：「你的梨仔瓜不好，只賣二塊三。」

笙仔摸摸胖胖的後腦杓。想着，等二十分鐘後沒賣得更好，價格反倒下跌了。他的妻子便喃咕起來。這款的市場，一點準則都沒有！又過了一刻，忽然又走來了一個年輕的販仔，伊也是不太用心來看瓜的。他又說：

「不好！只賣二塊錢。」

笙仔的妻子終於生氣了。他把聲音提到最高點，說：「不賣！」

瓜販又走了。

於是頭一個商人又回來了，笙仔夫婦急忙以二塊三的價錢賣給他，後來才知道當時市上的行情竟是三塊二！

第二個方法是利用口頭契約的不明確性，使農民吃虧上當。在言明「只挑好的買」後，蕭笙高高興興地以稍好的價錢做了一筆生意。於是商人精挑細檢，把好的全部挑光，使剩下的瓜成爲三、四級品。商人把撿剩的瓜用推車推還他說：「好了。」

「好了？」笙仔疑惑起來。他看還有半載的瓜仔沒有進去。

「好了。」他們快樂地笑着。

「喂，莫囉，還有半載咧！」「那些綠的我們不要，」他們站着身子來說。有些把汗衫脫下來拭汗，露出強壯的臂肌。

「你講瘋話咧！這些你不要，我拿去賣誰？」笙仔緊張了。他說：「好的你都揀去，留下這些幹什麼？」

「我們都買好的。」當中一個人說，他纏一條白帶子在腰部。都像電視裏的打手。

「鬼咧！天下那有這種賭贏不賭輸的，都是強盜！」

「你說話客氣一點，我們只買好的，你又不是沒聽我們事先聲明。」一個三角肌的也站出來。

「要打架沒關係。」白帶子的說。

「死人！走啊！」笠仔的妻子一看場面不對，她便不敢說，只怕笠仔被欺負了，就想拉他走開。

「鬼咧！你們都是強盜！」

笠仔的和煦暫時跑掉一分鐘，禁不住也要叫起來。

死死咬定打牛浦村和整個世界是無救地黑暗的蕭貴，也吃過類似的虧。言明任其採摘，在誠信的基礎上出公道價錢之後，瓜販把蕭貴園中的瓜採個精光，然後以品質不劃一為理由，出了二塊錢一斤的低價。在瓜田已被蹂躪一空的事實下，貴仔只好飲恨吃虧，還賠上一頓飯。

貴仔看看青綠的梨仔瓜，又看看商人又看看太陽，伊終於認定這世界無救了。

第三個方法，是延宕戰術。這是利用農產品保存時間不長久，農人必須急速脫手的條件，或利用農民運搬農產品來市集，都希望迅速、順利地脫手，以便趕回去料理家務農事的條件，商販故意拖延收購的時間，逼使農民在焦急的情況下，折價出售。「怒在棺材店」的一章，便描寫在兩天中，農民都急着快快售出梨瓜，但瓜販就是遲遲不在市場上出現。「一個個的瓜販仔都躲着

不肯出來。他們都像玩猴子的人。他們深知下雨天的打牛浦和十二聯莊是最焦慮的，一則面臨瓜價下跌的命運，一則又面臨瓜仔腐爛的劫數。「伊們要等到這批老骨頭來央求伊們廉價兮兮地購去，讓老骨頭淋夠雨，把價格淋成一斤五毛錢！」

打牛浦村的零散的、孤獨的、焦灼的瓜農，便在市集上任雨淋着。焦慮、惶恐、忿怒和怨恨在雨中逐漸累積起來。

突然秤量場那邊有人喊起來了。警察們的哨聲嘩嘩響，人潮像水般動盪起來。有人喊着「吵架了！吵架了！」原來是一個瓜販和打牛浦的人吵上了，在秤量場那邊用牛棒來毆擊着。

棺材店避雨的人也不耐煩起來。他們站到馬路上去，大喊：「伊娘！老躲着不來買梨仔瓜，還要打人，什麼意思。伊娘，打！」

這樣講着，便要去搶棺材店的木板。

路上的人都紛紛動搖起來。

「找伊理論去。這種吃人的瓜販。」

寺廟和農民

無從理解、更無從把握的現代市場和商情，現代經營知識的缺如；時時刻刻都需要現款去購買工業產品以生活、以投資於土地；零散、薄弱的資金不足以自己經理運銷和販售其產品於消費市場；瓜販獨佔下的孤立感和無力感——這一切，都使農民寄托其命運於未知、神秘的超自然的

力量。於是各種宗教迷信，廣泛地繁延於今日的農村。堂皇的寺廟，獨立於貧困的農舍社區之中，成爲不可思議的對照。「問罪大道廟」的一章，以插曲的性質，描繪了寺廟對於農民的斂取。辛勤種植，又含悲賭氣賣掉的一百斤、兩百斤……甚至一千斤梨瓜，便落入以地方政治領袖「鄉民代表」爲主任委員的大道廟管委會的財庫裏。

其 他

長年以來低米價政策固然壓低了工資，從而增大了產業資本的利潤率，養肥了臺灣的工業，即使農民收入在日日高漲的工業產品的世界中逐步、相對地降低。廣泛農村米倉設施的不足，或突來的水潦，皆可使稻米在雨水中生芽霉腐，使豐產低廉的米愈益跌價，使農民受到進一步的損失。

這是每年打牛滴的大季節。早先在農村極不景氣的時候，每期的稻子都有賠錢的。尤其是一期稻作浸過水，發芽降到三百塊，許多人都沒有賺錢，這一次的梨仔瓜便成了他們唯一的希望。

在自由放任的經濟下，公共設施比較差、資源比較貧瘠，自然條件比較壞的農村，和這些條件都比較好的農村，存在着發展上的不平衡。打牛滴和十二聯莊的經濟並不見得很好，但是蕭貴在歷盡挫敗，降身和鬍鬚李去當行腳瓜販的所在——沙仔埔，一個貧困的漁村，梨仔瓜最貴只能賣一塊錢。

五、「打牛滴村」的藝術性

「打牛滴村」的深刻現實性，生動地表現了當面廣泛臺灣農村社會生活的現實，和這些現實中的問題點，從而也反映了這些問題點下生活着、勞動着的人的葛藤。我們從集中地、典型地反映在宋澤萊的「打牛滴村」現實，看見了不同於鍾理和時代的，在唯工業化論和唯成長論體制下類如打牛滴村的農村的現實形象。這種深刻的現實主義性格，鮮明地使「鄉土文學」突出於一向一般地比較缺乏涉入和關心的臺灣音樂和繪畫，而表現了近代臺灣小說在描寫、批判和抗議上獨特的積極性。

當然，單只是現實性，不能造成一篇優秀的小說。小說，既然是藝術的一種，便要充份地注意它的藝術性。「打牛滴村」無可爭辯地具備了生動地表現上述現實性的藝術技巧。

人 物 論

「打牛滴村」以蕭氏兩兄弟爲主要的人物——這只要看「笨仔和貴仔的傳奇」這個副題就甚爲明白。其實，「打牛滴村」最大的成就，正是在於它塑造了七〇年代臺灣農村的兩個典型的人物。

蕭笨是蕭家老大。蕭笨並不是打牛滴的本地人。

以前，蕭家是打牛滿困苦的農家。在早年，你到打牛滿來問首富，他們都會說：三牛。這三牛都是李姓的宗親，以前打牛滿都是李姓的天下。蕭姓只不過是別地移來的，像一棵在稻子下的稗子。

這個蕭笙，沒趕上在土地改革後，臺灣農村經濟復甦的時代中，在農村廣泛推行的國民教育。「因為蕭笙是老大，一塊種田的料子，又趕不上國民教育，所以沒唸書」，也便大約是個文盲，屬於臺灣農村前一代的末尾的人。笙仔的第二個弟弟蕭勳終於留學美國，「據說在美國的紅人州唸書，又在那裏謀生，順便把最小的妹妹帶去嫁給美國人。」而老三蕭貴，也受完高農教育。他們全是第二代的農民。

蕭笙為人滿足、圓滿，脾氣極好：

這個老大笙仔，有一個大大的頭，像月亮般圓圓的臉，看到別人總是和和藹藹。伊底身體胖碩得像牛一般。頭上披一叢金色細膩的髮，講起話來也是細微的。

蕭笙一生中最大、最終的美夢，是在終生操勞後，能在晚年時養一窩豬：

笙仔不禁想到他一向的宿願：在他老時，那時他的髮白了，走路拿着拐杖；他的小孩長大了，他一定要在自己空曠的田地裏蓋一幢大豬舍，養一大羣藍瑞斯。他要坐在藤椅上，喝着兒媳們泡好的茶，然後望着四邊的田野，望着豬舍、天空、厝烏，呼吸着帶有異香的空氣，然後沈沈睡去……睡去……。

其實，這樣的一個「宿願」，是和他對於人生的看法有關的。他總以為人的一生，應該像豬一般地飽食無憂——雖然「你莫要光看社區的那些漂亮花草，現在還是有許多人窮得住在竹盧裏像修道的人。他們始終都沒有翻過身咧！」

有一陣子飼料被摻了牛脂，死了很多豬仔。笙仔可慌了，總要泡一點飼料水來品嚐。他認為死了人可以，死了豬仔是不應該的。每一次伊的豬仔長大了一點點，他肥胖的臉便浮出一點和藹的笑容。他總想：人生最大的樂事，是像那些畜牲罷：有人養着，和和氣氣，身心都坦然無憂。他是把自己用來比較於那些豬的。伊不明白：除了舒服和享受外，人活着究竟要幹什麼。

以「有人養着，和和氣氣，身心都坦然」為已足的人生觀，並不因着現實的困厄而有所改變

蕭笙在那段日子也跟着打牛滿吃着簡陋的飯。但伊底吃住雖沒改善，可是伊底人生觀也沒改變；生活雖不和煦，但對事對人可是永遠和煦的。他若與人談話，不管怎樣，打從心底都要浮起快活的微笑。他的微笑憨直，可以說是迷人的吧，和他談話的人也都高興。為此和他在一起是一種樂事。不管是什麼，只要遇上他就一定是有趣的。就比如說有一次放田水，上游的人把水堵死了，只留一絲給他。伊沒有絲毫的怨言，只把那一點水堵起來，點點滴滴灌溉自己的水田去。但下游的人便跑過來，要伊把水讓出來，伊也毫無異議。那人在搶水的怨氣中罵他一句，幹你娘！但伊用和煦的微笑來回敬他，兩人便哈哈地笑起來。最後他的秧田慢插了幾天，但他還是笑微微的。

蕭笙「最喜愛一大羣一大羣的人了，他也喜歡熱鬧，從來不爲人多而心煩」，而且一口氣生了六個孩子。他喜愛人生。人生中的苦難、挫折，甚至遭到欺奪、凌辱的時候，笙也不改其和煦。在市價三塊的時候，瓜販串通好欺騙他，使他以二塊三的價賣出去。「然則，笙仔沒有責怪誰。他想三塊和二塊三，只差一些罷了。若小孩不慎生了病，一花就盡了，多賺少賺是沒有必要計較的」。於是他又想起要養一窩藍瑞斯的宿願，「想一想，他又高興起來」。在一個令人懊惱的、焦慮的雨天的泥濘的瓜市中，他「整個人愉快得像騰空一般，和晚年時睡在豬舍邊大約是沒有兩樣的，所以這世界便用不着你來計較：休息的時候是快樂的；勞動的時候也有它的快樂。甚至伊也相信，餓肚子的時候也是快樂的。」唯獨有一次，瓜販把他的好瓜全挑揀個精光，留下賣不出去的半載青瓜，他才忿忿地說：「鬼咧！你們都是強盜！」但是按照笙仔的和煦的脾氣與和煦的哲學，那忿忿大約只維持「一秒鐘」光景吧。

蕭笙是一個典型：善良、知足、「和煦」……但他却絕不失去一個農民的勤勞。他披星而起，摘瓜、養豬、賣瓜。在艱苦的生活中，他「和煦」的性格撫慰了他無數的挫折。他熱愛人生，熱愛生活，熱愛人羣，懷着終於要養一窩藍瑞斯的卑微的宿願，過着日復一日辛勞的生活。當然，他也從來沒有想要改變他的生活。他以農民特有的韌性，加上他善於快樂、善於不加計較的個性生活過來，也將照樣的生活下去。

蕭笙的弟弟貴仔，恰又是另外一個對比。而且無疑地是這個故事的中心。他受過高農的教育，如今是農村中數目不少的半知識份子。

貴仔是瘦楞楞的一塊排骨，走起路像風中搖擺的蘆葦。伊有張削瘦的臉龐和高高的顴骨，一雙像飛進沙子的濕苦的賊眼，雖然是面貌不揚，但以前在唸農校時，伊可是懷着志向的。他愛種柑桔，畢業後回家就要發明新品種，厝前厝後種滿了綠桔樹，但大約沒有成功，都變成枯乾的樹枝。

受過教育，就有了一些知識，也就有了一些「志向」，也就容易按着這些知識和「志向」去批評甚至改革這個世界。他在一、二十年來落後、貧困的打牛浦，過着憂悵、貧苦的日子，整天唉聲嘆氣地說：「唉！黑暗的打牛浦……。」

和他的大哥笙仔一樣，貴仔也斷然不是個只知道擺擺知識份子的身段，不事勞動，空言抱怨的人。他「從來沒有偷懶過」。事實上，他沒有一刻不掙扎着要從打牛浦窒悶的貧困中解脫出來。勤勞終日而猶不得一飽，使他「很忿怒起來，便要用廢耕來表示伊的抗議」。他攔下田不做，跑到市鎮去，當一家餐館的淫媒。「剛開始果然賺了一筆錢，很贏得守窟在打牛浦的鄉親底崇敬」。

但是半知識份子的善惡心使他不安。「不久，貴仔的憂悵症又發作了，因爲城市底罪惡和游離使他很不安」。他於是想起他失敗了的柑桔新種試驗：一株株立地不動的柑桔。他想：「這世界和柑桔的世界是一樣的，要接上強勁的根幹，才能生出結實的果子。」

他終於受到警察的取締，「被關了幾個禮拜」，乃重又迤邐回到打牛浦種田。「伊却始終沒有忘却要來圖存」。他應考而當上了當時國民中學的「作物栽培」教員。他勤勞、認真地教，

學生却嘲笑他是個「掘墓仔的」。他「憂悵的眼珠便瞧見了教育界的黑暗」。他「忿怒地在校務會議上大罵教育制度」，甚至批評政治，「結果被警察叫到分局去問口供」。他被解聘了。

他是個傷痕纍纍的人。他的悲劇，在於他不若笨仔那樣逆來順受。他對於任何方面來的壓力、挫折和凌侮，都要反抗，但結果，這孤獨的、受村民嘲弄的抗議，徒然只成爲一個新的傷痕，沉落到他「黑暗的」心中不斷地「發酵」。「據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貴仔在警局的記錄是够瞧的，包括不健全、誣告、煽動、詐欺、妨害善良風俗等，大約已經集打牛浦有史以來罪惡的大成；是打牛浦的芒刺」。

然而他又自份高人一等。他不屑於被人與李來三並列，然而他那比李來三好的瓜田，却包不到李來三的好價錢。他以爲自己不同於打牛浦芸芸的愚昧的農民，是不容瓜販任意欺詐的，却讓瓜販以最低的價錢，將他希望所寄的一片瓜田蹂躪淨盡。他自以爲比鄉人先知先覺，想起自己直接把瓜果運到鄰近的鎮上，交給水果商人，却不料早已有人捷足先登，而且由於惡性競爭，價錢比打牛浦市集上的還壞。他瞧不起農村無產無業的行腳商販鬚鬚李，却終於不得不和鬚鬚李成爲合夥人，把好好的梨瓜，在更落後、更貧瘠的沙仔埔，當做爛瓜臭果賣出去。

在傍晚時，斜陽甫掛在大道公廟破陋的屋瓦上，打牛浦有些殘缺的村廓都濛在一層光燦中時，小柏油路上便看到一位穿着寬鬆褲衫的人在那裏吹口哨。他還穿着一雙破布鞋，雙手插在口袋裏。頭髮亂得像牛啃過的稻草。這時他什麼事都不做，只望着人窮瞪眼。偶爾停下來，瞪着地上的石頭想半天。大家又嚇一跳，以爲是十二聯莊跑出來的瘋子。但他一概不理，有時忿怒起來，便要打他們。小孩子嚇得跑了。後來大家才看清，這個

人是蕭貴……。

貴仔便是在這樣失神的情況中登場的。做了各種努力「圖存」於打牛浦而終於挫敗的蕭貴，大約也在失神的狀態中，奮筆直書了「建議要改革崙仔頂的瓜市場」、「鼓勵打牛浦的人團結起來打商販」的文件，貼在「蕭家的牆上，還有打牛浦的告示牌上、柳樹榦上、社區牆上」。最後，留下全村人的嘲笑，「蕭家兩兄弟就被請到警局了」。

曾有一次見到宋澤萊。他稱類如「打牛浦村」的小說爲「卓別林式的」。當時我沒有就「卓別林式的」含意，和宋澤萊議論過。如果蕭貴是宋澤萊的卓別林，則又比卓別林更多了一種半知識份子的理智——尤其蕭貴在大道公廟的一場委員會中，怒斥鄉民的愚昧：

「你們就不會討論怎麼地把瓜仔賣出去的事嗎？只會做這些蠢事嗎？修什麼廟？梨仔瓜賣不出去修什麼廟？你們一世人只做愁頭，駛伊娘咧！會議是用來宣揚和決策緊急的，不是做這些鬼怪的事啊！」

• 「村滴牛打」評試 •

這是一個頭腦清醒，有見識、有理論的改革者的議論。低於一般人生的，在性格上僵執了的卓別林——蕭貴，在做這議論時，便與讀者屬於同一個人人生，而失去了喜劇性，也從而失去了包蘊於喜劇中深沉的悲哀。但是，不論如何，宋澤萊已經塑造了兩個活生生的人物。一個胖子，「和煦」、快樂、「古意」得叫人悲酸；一個瘦子、失神、不快樂，用盡全部的力量和生活，和瓜販——甚至整個打牛浦格鬥，爲了圖一個生存。而且更其重要的，是透過這兩個典型化了的人物

，生動、活潑而且相當深入地表現了七〇年代臺灣農村實際生活的各種條件，以及生活於這些條件下的臺灣農民的困境。

結構論

故事寫蕭貴抵抗包田商、拒不包田；終於上當以低價讓商人把他的瓜田劫掠一空；試着直接運銷瓜果於鄰近的鎮上，但發現瓜販間劇烈的削價競爭，使計劃失敗，最後「降尊紆貴」地幹起行腳瓜販，仍然虧損慘重，而終於怒而號召村民改革瓜市，抵制瓜販，以致為警察所召。

動作的邏輯，十分清晰。當然，在結構上，「問罪大道廟」的一章，其實只是一個插曲，在結構上和整個構成的關係中比較不那麼密着。但是，整個故事中，作者一直冷靜地站在故事以外。沒有作者個人的感傷、個人內心的瓜葛。我們在「打牛浦村」看見了具體的社會，具體的生活，具體的人——以及由具體的社會、具體的生活和具體的人所構成的脈動着的歷史。

語言論

現實主義的題材——鮮活、動人、興奮、遼闊的題材，顯然感動了作者自己。因此，有的時候，你感覺到作者那麼匆忙、那麼興奮地用語言去追捕不斷湧現和發展下去的情節，因此語言便顯得比較粗糲，比較有欠斟酌。但更多的時候，宋澤萊的語言從容、清晰，而富於敘述的濃厚的趣味。不若有些宋澤萊的其他比較個人主義，比較「現代」的作品，在「打牛浦村」中的語言，

因為受到「打牛浦村」現實主義內容的規定，就沒有那種造作；那種爲了刻意追求荒疏、夢魘般的語言效果；那種把語言經營得徒然看見形式性的語言而不見內容，使一篇小說變成一片語言的遊戲所表現的無意義的個人內心的葛藤，而不見具體人生和具體生活的發展。

在效果最好的許多地方，宋澤萊以新新發展出來的富於敘述性又富於個性的語言，爲我們描寫了陽光下打牛浦果市場的全貌。對於瓜農、瓜蔬市場，簡直是「折磨伊們憂患的心」，「壓抑着心懷，好比一個生悶氣的小孩」的「刑場」，「繁囂而充滿了慾念。凡是到這裏來的人，都好像沉到水底去，看不見什麼，聽到的只是盈耳的聲音，呼吸和心跳都變得困難了。」宋澤萊爲我們描寫了整個市場，市場中擁擠蠕動的人羣，窒悶的、充滿了慾望、又充滿了焦慮、也充滿了各種心機的市場，以及圍繞這市場而展開的七〇年代臺灣農村的生活和社會。宋澤萊的語言，毋寧是在他描寫和敘說這些充滿了現實性，充滿了生命力的具體生活時，被賦予無比的活力，在摻和一種粗糲、一種地方氣息、一種嘲弄和深刻同情的氛圍中，產生了「打牛浦村」獨有的語言。所謂「內容決定形式」，就小說而言，不止是內容決定使用什麼性質的語言，還意味着內容自然地使語言彰顯出相應於表達一個特定內容時所必要的各種語言的質素。比較宋澤萊「打牛浦村」的語言，與宋澤萊其他比較個人主義、比較形式主義的作品中的語言，這一點就顯得尤爲昭著了。

六、結語

「打牛浦村」反映了當代變貌中臺灣農村的諸問題；描寫了變貌中臺灣農村裏的人的困境；

生動活潑、深入地表現了當前農村中最急迫的問題點。這問題點在最近中央和農復會、省議會相繼提出主張，要解決全面無限制購糧問題；廣建農倉問題；提倡合作經驗，在小農制土地所有體制的基礎上爭取大農制農業經營問題，干預農產品運銷，以減少中間搾取，提高農民收益，減輕消費者負擔——這些議論和提案，說明和印證了「打牛浦村」的重大現實主義的意義。

相應於題材和主題意念的現實主義特點，「打牛浦村」在藝術表達上，也有很好的成績。在人物上，宋澤萊塑造了活生生的、具有深刻現實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蕭笙，一個逆來順受、以和善的性情溶化現實生活中苦味的挫折和傷害、野草一般卑小、柔軟地生活着的農民。蕭貴，一個農村的半知識份子，竭盡心力「圖存」於商業資本深刻滲透下的農村，而屢遭折辱。每一個挫折成爲另一個心中的傷痕，使他憂悶、拗悞，越來越深地沉落到他自己「黑暗」的世界。「打牛浦村」沒有個人內心不可解釋的葛藤；沒有病的夢魘、沒有恁恣的自我中心所恁恣地搭建起來的非現實的、不負責任的世界。「打牛浦村」不是一個想像中的、沒有歷史、沒有生活、沒有現實的世界。正相反，在「打牛浦村」中，人們看見現實通過具體的社會、具體的人，具體的人在具體社會中的生活，以及由具體的人、具體的生活、具體的社會所構成的歷史的強勁的流動。語言已不是語詞的遊戲、誇大的聯想，甚至終於消滅語意本身的「現代主義」文學的語言。語言在描寫、刻劃、敘述生動的現實主義題材時，在清晰的、可充份傳達的語句中，顯現出語言表現上無限遼闊的可能性。

宋澤萊是近五年來出現的、年輕的、創作力豐沛、寫作態度異常認真的作家之一。他似乎一直在嚐試着不同的創作路線和形式。但是我們認爲他大量而勤勞的努力中，「打牛浦村」是一條康莊的、寬闊的、許諾了無限發展可能性的寫作道路。宋澤萊已經毫不含混地表現了他在寫作上的雄厚的潛力。不論他自己是否有意，他的「打牛浦村」，已經把爭訟紛紜的「鄉土文學」推向一個新的水平。自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成爲中國的一省。光復後的第二個中國文學的世代，正以辛勤的努力、充實的生活、嚴肅的態度、謙虛而又滿有信心的胸懷逐步寫出一篇比一篇好的小說。宋澤萊和宋澤萊一代的其他同樣富於青春和才華的，在臺灣的中國文學家，終於是要不可威嚇地、不可誣陷地、不可抑壓地茁壯起來的——這是宋澤萊的「打牛浦村」給予我們的最鼓舞人心的訊息。

註：有關臺灣經濟發展的材料，大半引用侯立朝先生論文「臺灣鄉土經濟望春風」。